

广州讲坛演讲录

第三辑



 商务印书馆

广州讲坛演讲录

(第三辑)

主 编：王晓玲

副主编：汤应武

商务印书馆

北京·2008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讲坛演讲录. 第3辑/王晓玲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ISBN 978-7-100-05880-3

I. 广…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817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广州讲坛演讲录

(第三辑)

王晓玲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880-3

2008年9月第1版

开本 650×1000 1/16

200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31.00 元

序

近两三年来,国民生活中的一个新现象是讲坛文化的兴起。全国许多省市,讲坛遍地开发,听讲座成了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讲坛有不同种类——一类是大学里的讲坛,由校方、院系或学生社团主办,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一类是企业、单位、部门内部的讲坛,目的是培训骨干和员工;还有一类是向社会开放的公益讲坛,大多由地方党政部门主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讲坛文化的主体,在我看来也是讲坛文化中最有意味的现象。我本人曾应邀在不同种类的讲坛上做演讲,其中政府办的越来越居多,这个经历使我获得了亲身感受,并推动我思考其意义。现在,借为本书作序的机会,我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众所周知,在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以后,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成了困扰党政干部的一个难题。以前那种单纯意识形态灌输的模式越来越行不通了,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接受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在目标、内容、方法上皆有所转变。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可以把党政部门主办公益讲坛看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创新,是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转型,是在实践中形成和普及的新形势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之一。

我试以本书为例略作分析。广州讲坛是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开放的公益讲坛,迄今已开办四年多,演讲的结集也出到了第三辑,是同类讲坛中比较成熟的范例。我们看到,一方面,讲坛所邀请的主讲人是各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和学者型官员,演讲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教育、法律、文化、卫生等广泛领域;另一方面,讲坛向广大市民开放,自愿参加,听众是对知识、思想以及相关讲题感兴趣的各

界人士和普通百姓。作为主办者的党政部门在这里主要起组织、宣传和引导的作用,为精英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搭建有效的平台。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模式相比,这是重大的转变。一个关键的转变是,目标不再是培养驯服工具,而是切实地提高公民素质,在精神层面上建设好现代文明社会。党政部门的水平不是表现在向人们提供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是表现在提供最好的服务,为人们追求真理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党政宣传队伍自身的素质也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经济转型开始得比较早、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地方,例如广东和浙江,这个类型的讲坛文化也兴起得比较早,发展得比较成熟。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在民众这方面,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从而感觉到了对精神生活的迫切需要。在政府这方面,经济转型有力地促进了其观念和职能的转变,加强了服务意识,包括在满足精神需要方面为民众服务。广州讲坛便是如此,自创办以来,围绕“高、优、新、活”下功夫,努力向广州市民提供高端优质的讲座服务,已成为广受欢迎的讲座品牌。从邀请的主讲人名单看,组织者对当今国内思想前沿的情况相当了解,对讲题类别的安排比较全面,从讲座前的预告、讲座时的会场组织和网上直播、讲座后的媒体报道和电视播放以及演讲集的适时出版看,每一个环节都做得认真细致,说明讲坛团队具备了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一次讲座的效果之好坏,取决于主讲人、组织者和听众三方的水平。主讲人的水平,不论是学识和思想水平,还是口头表达水平,其实是基本确定了的,区别在即席发挥得好不好。凭我的亲身经验,我发现,发挥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对会场氛围的感受。而这个氛围,主要是由组织者和听众造就的,即组织者是否让真正想听你的讲座的人来了,对讲座环节的设计是否合理和活泼,听众对你所讲的内容是否真正感兴趣并且有所思考。我是去年5月做客广州讲坛的,讲座在艺博院报告厅举行,三百多个座位满座,听众聚精会神,我能感觉到台上台下的无声交流,互动时提问十分踊跃,会场气氛始终很好。这

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为此我衷心感谢广州讲坛的组织者和听众。

最后,我要说,讲坛文化的受益者不但是听演讲的公众,也包括演讲者自己。尤其像我这样以前只在书斋里生活的人,演讲的需要促使我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也促使我锻炼口才,学习用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听众的即时反馈也帮助我及早发现自己思想中的欠缺、谬误和模糊之处,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其实,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家大多是演讲和言谈的高手,雅典街头到处是哲学家与民众互动的讲坛。就此而言,今天的讲坛文化是向哲学原生态的一个初步的回归。比哲学家更突出的是,当时的政治家一定是演讲家,是靠演讲影响公众和贯彻政见的,而这个传统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民主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我十分赞赏中国今天的政治家登上公众讲坛,相信这对于政治家和公众双方都是一种良好的民主训练和实践。

周国平

2008年6月13日

目 录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与和谐宗教	叶小文	(1)
长征的艰难历程及其历史意义	张树军	(21)
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	单霁翔	(45)
文化与国力	张国祚	(59)
明亡清兴六十年	阎崇年	(67)
创意产业——崛起与发展	贺寿昌	(77)
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与创新型城市战略	吴汉东	(96)
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	周国平	(117)
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	厉以宁	(139)
21 世纪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殷大奎	(163)
网络文化与社会生活	欧阳友权	(179)
当代中国大学解读	陈平原	(198)
阅读经典 感悟成长	于 丹	(221)
城市竞争力：全球、中国与广州	倪鹏飞	(238)
全球粮食危机：问题与前景	程国强	(259)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与和谐宗教

叶小文

(2006年7月20日)

叶小文，湖南人，1950年生于重庆。现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学会、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外交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昌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国防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全国政协九届、十届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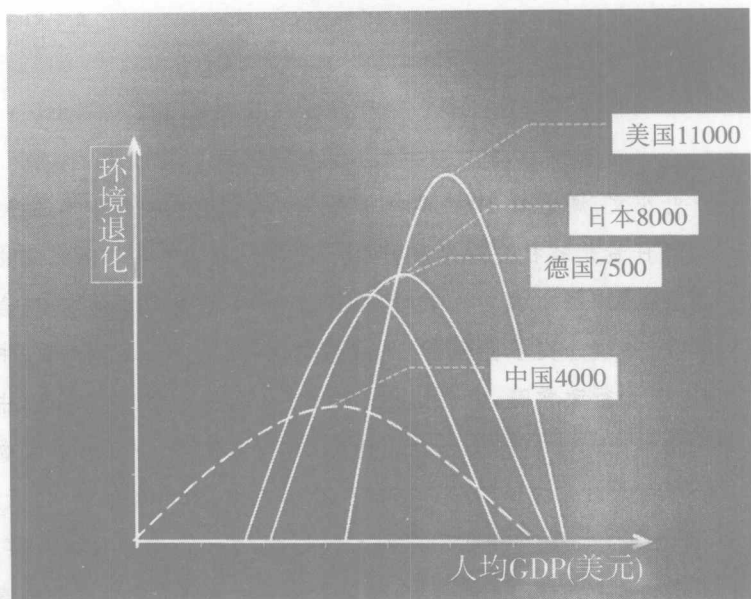
主要从事宗教、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工作，多年来坚持“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在不同的实践领域，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分析不同的社会问题。已出版《多视角看社会问题》《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化对抗为对话》《从心开始》等著作。

现在，“和谐”一词使用频率很高。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我把它叫做“双和模式”。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赢得了全世界的赞叹和敬意，但是也因此有了“双重紧张”。因此，我们积极回应，提出了“双和模式”。

“双重紧张”造成了“双重焦虑”

什么是“双重紧张”？第一是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看看我们的环

境,天空不再是蓝天,海洋也在被污染。快速发展引起环境的破坏、环境的紧张。但是发展的脚步能停下来吗?不能停,因为中国最大的事就是就业问题,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不能停下来。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于是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就紧张起来。



库兹涅茨环境倒 U 曲线

我们可以用库兹涅茨环境倒 U 曲线来说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这个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 GDP 的增高,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随之增长(倒 U 曲线的左侧);只有当人均 GDP 增长到一定程度,环境破坏的压力才能达到临界点或转折点(倒 U 曲线的拐点),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和恢复。要越过这个拐点,美国要到人均 11000 美元,日本人均 8000 美元,德国人均 7500 美元。中国人口基数大,也要到人均 4000 美元。过了这个拐点,经济越增长,环境的破坏才会减少。我们现在正处于 1000 美元到 4000 美元的阶段,当然珠三角和长三角跑在前面,但是也没有超越 4000 美元。我们正在

爬坡阶段,经济的增长一定程度上还在以环境的加速破坏为代价。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不是很高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相对是比较高的。我们过去说“地大物博”,这是真的。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地贫物稀,不够用。现在最关键的是油价,八国峰会也在讨论油价,油价还这样涨上去怎么得了呢?如果最后没有油的话,我们海陆空的交通工具都要改造,卡车就要用马来拉了。

我们不能这样搞下去,我们只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延缓和尽量避免整体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且尽可能地节省能源。也就是说,为了缓和发展引起的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我们要在这根倒U曲线左侧将陡坡降下来。国家“十一五”规划有两个基本指标,一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比“十五”时期末要降低20%,二是GDP仍然要保持7.5%的增长。这好比又要马儿快点跑,又要马儿少吃草,不难呢?太难了,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研究宗教问题,撇开这些问题也是不行的。

第二是快速发展引起了人和人关系的紧张。学者们用基尼系数来说明,如果基尼系数悬殊太大,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4。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到了多少呢?根据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到了0.458,超过警戒线了。基尼系数如果不降低,不少人就难以安分守己,社会心理就处于危险的状态,一方面是社会充满了诱惑和活力;另一方面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社会处在多事之秋。

两个高度紧张造成了“双重焦虑”。首先,是社会失范的焦虑。打一个比方,如果公路上的车子十分堵,你还有什么交通规则呢?大家就会搞得很焦虑、烦躁,司机一定会骂娘的。焦虑主要表现为快速发展造成一系列的两难选择。1989年,我做了一个社会心理机制转换的举证,用了一些图示来说明。我的结论简单说就是,在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中,我们实际面临一系列的两难抉择,社会心理压力具有既要促进平等竞争,又要促进共同富裕的双向作用;社会心理预期具有既要参与竞争,

实现先富一步,又要节制竞争,避免两极分化的双重风险;社会心理互动具有既要靠竞争激发心理活力,又要以协调融洽心理氛围的两重功能;社会心理取向具有既要求得效率提高,又要求得社会公平的双重使命。

在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中,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既有群众因素,也有干部因素;既有发展不够的因素,也有公平不够的因素。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公平不够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群体性事件有增长的趋势。

我们有两难的选择,世界就更加难了。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但是主流之外暗流汹涌、波诡浪急。人类陷入另一种困境: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失衡日重;贫富差距拉大,穷困饥饿增生;飓风海啸骤起,莫名疫病流行;暴力冲突不断,恐怖袭击频仍。

还有一个焦虑是文明冲突的焦虑。社会本来要靠文明来支撑和重建。现在大家熟悉的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它们是相伴而生各执一端,冲突不断,争斗迭起。应该看到,现在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至少从目前来看,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讲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的前途一片光明。但为什么前面要讲那么多的紧张和焦虑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面对社会的失范和文明的冲突,我们不必悲观失望。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也必须要有深刻的思考和前瞻的对策。中国对双重紧张的缓解之道、对双重焦虑回应之策,是在国内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呼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一个积极应对“双重紧张”、缓解“双重焦虑”的崭新模式:对内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呼吁共建“和谐世界”,我们简称为“双和模式”。

“双和模式”要求宗教是和谐的

前面讲了这么多,跟宗教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个“双和模式”,当然要求宗教是一个和谐宗教。宗教是冲突因素

还是和谐因素呢？宗教当然是和谐因素，1993年全世界6000多人参加的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你们愿意人们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就像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宗教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因素。2000年，我曾经率团参加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这个大会通过的宣言说：“我们的世界被暴力、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于是，宗教又成了冲突因素。

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结伴而来。霸权主义来了——“我希望你参加美国军队”，美国以其雄厚、强大的美资、美军为背景，既要反恐，也要称霸。国际恐怖主义来了——“我希望你去打伊拉克”，国际恐怖主义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崛起的大潮为背景，前赴后继、此起彼伏。

恐怖主义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死，让更多的人看到，它就是这样的信条。远的不说“9·11”事件，就说2005年3月11日马德里火车站大爆炸、7月伦敦连环大爆炸、埃及大爆炸、新德里10月29日大爆炸，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慢慢就炸到我们的旁边，11月9日阿曼有一个大爆炸，正好我们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在那儿参观，一下子炸死我们3个师级干部。2006年7月11日，印度第一大城市和金融中心孟买发生7起定时遥控的高烈度爆炸，5起发生在站台上，2起发生在火车上。爆炸发生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期，惨无人道，惨不忍睹。巴勒斯坦一个女大学生，才18岁，她跑到超市引爆炸弹，买东西的老头老太太也被炸死了。她自己录了音，“无自由，毋宁死；无尊严，毋宁死”；还有“黑寡妇”，他们的兄弟丈夫父亲被打死了，她们被告知如果做了人体炸弹就可以上天堂跟他们团圆。现在文明世界乱套了，丹麦我们都知道出童话，美得很，现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漫画，严重侮辱穆斯林，将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激怒了。当然中国的穆斯林也反对漫画侮辱穆斯林，但是中国的穆斯林很理智，他们通过合法的渠道反映自己的诉求。

有学者指出，现在文明世界不仅会爆发冲突，而且更有可能出现文

明的崩溃。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亨廷顿写了一本书,题目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于是有人不服了,他的同事又写了一本书,叫做《文明的崩溃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什么是文明的崩溃?“9·11”事件当然是文明的崩溃。什么是文明世界秩序的重建呢?要新修世贸大厦,最后全世界广为征集方案,有人设计了这么一个智能大厦,飞机一来就躲了。美国要改造整个伊斯兰,伊斯兰世界有12亿~13亿人,它怎么能改造呢?当世界提起阿拉伯时是要致敬的,因为阿拉伯人曾经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世界文明。美国要改造伊斯兰,伊斯兰还要改造布什呢。

上面我讲了两个背景,谈到“双和模式”要求宗教是和谐的,我举了一些例子,宗教被夹在冲突里面。怎样看这个问题呢?不能仅仅靠这些例子来说明问题。宗教问题错综复杂,我们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的态度,进行周密考虑。

宗教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

宗教现象从根本上来讲是长期性的。提起宗教,大家就想到天上的神和仙,宗教在哪里呢?宗教就在人们的心里。提起宗教,我们就想起教堂的顶和寺庙的烟,宗教就在人世间。但实在又说不清楚什么是宗教。德国哲学家杜林曾阐述过宗教的本质,但完全是胡说八道。为驳斥杜林,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一书。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段话不太好懂,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佛教讲观音,观音不得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能够普度众生,观音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大家看观音像,那么慈祥端庄。为了她的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她的手就很多,而且还那么的美,手里还拿着很厉害的法器。人体哪儿有那么多手呢?但不仅我们觉得她美,全世界都觉得她美。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舞蹈“千手观音”,

就感动了世界。

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一路走过来,向未来社会一路走过去。各位宗教界的朋友不一定同意这种观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阐明为什么会有宗教。“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不要宗教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发现不对头了,中央为此出台了19号文件。文件对为什么有宗教作了解释,说宗教观念最初的产生,反映了在生产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原始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打雷、下雨,更不知道为什么会生殖繁衍。进到阶级社会之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无法摆脱这种盲目力量的控制,在于剥削阶级要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这些话都是出自马克思。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压迫劳动人民的意志力量。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往前推,社会主义社会压迫越来越少,宗教也就会越来越少,共产主义就没有压迫、没有宗教了。社会主义有没有宗教?共产主义有没有宗教?我们经过大量的理论论证,得出了一个结论:“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问题于是来了:进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还是剥削阶级压迫吗?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那我们这个社会是没有精神支柱失魂落魄的社会吗?这就解释不通了。我们看到宗教还存在,宗教发展得还很好。这是怎么回事呢?对此,马克思没有明说。有一个叫鲍威尔的人骂犹太人,说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迫害犹太人,就是因为犹太人信犹太教,令人讨厌。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谈论犹太人的问题,说问题在于完成了政治解放后怎样对待宗教。马克思说,我们既然看到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的国家(指美国),宗教不仅存在,而且是生机勃勃地富有生命力地存在,这就证明宗教一定会存在,和政治解放的完成是不矛盾的。马克

思接着说：“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来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要把世俗问题化成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才华横溢，他这一段话含义非常丰富。有人形容马克思，说他的头脑就像是一艘待发的大军舰，里面的东西太多了，让人搞不清楚。我注意到他这一句话：“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来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为什么会有约束？因为要逃避苦难，就有世俗的约束。由于马克思处于充满苦难、充满压迫的阶级社会，他更多地关注人们的“世俗约束”，因此在他看来，宗教主要是对苦难的说明和解脱，是对“世俗约束”的忍耐和反抗。

今天是新社会了，谁来压迫我们呢？为什么宗教还仍然很旺盛？不管你信不信教，人类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要摆脱此岸的苦难，走向彼岸的幸福。全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幸福追求，是在不同的阶段追求不同的幸福。我们要美丽要幸福，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来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很好，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摆脱此岸的不满走向彼岸的幸福。追求幸福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总是不满此岸的苦难，追求彼岸的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追求，或者说共同的幸福追求又有不同的感受。托尔斯泰有句名言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幸福通常也会有很多不幸，不是你想走向幸福就可以走向幸福，很多人想发财发不了，要升官升不了，有很多的约束、很多的苦难，特别在旧社会当中苦难更多。当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着强烈的期待。这两年有一个时髦的词叫“幸福指数”，指的是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各地

开两会、全国开两会,除了关心 GDP,就要关心你这个地方的幸福指数,以至于提拔干部,也要看幸福指数是不是提高了,考察政府工作要看幸福指数如何。

对世俗约束的承受和忍耐、认识和解脱、挣扎和反抗,导致了人们接受宗教的约束,因此可以说对世俗的追求也会导致人们对宗教的追求。宗教反映了人们对幸福追求的诸多困惑,提供给人们对幸福追求的强烈诱惑。从这个角度讲,宗教其实也是一种世俗追求。我们来看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如何提供给人们幸福追求的强烈诱惑,让全世界几十亿人跟着它们跑,跟着它们走向幸福。

佛教怎样带领我们摆脱此岸的苦难走向彼岸的幸福呢?佛教很重要的就是将苦参透,佛教告诉我们“有漏皆苦”。我们不妨想想,因为用眼、耳、鼻、口、身等这些漏洞,于是人生的五大烦恼就进来了。你的心就像是动物园,有猴子抓、老虎吼,于是觉悟,要堵住这些洞,才能摆脱此岸的苦难走向彼岸的幸福。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生老病死都是苦,大家好理解,你看母亲生一个孩子,痛死了。什么叫“怨憎会”呢?就是你最憎恨的人天天跟你在一起,你烦不烦呢?什么叫“爱别离”呢?你最爱的人你就是见不到他,你苦不苦呢?什么叫“求不得”呢?大家在这里求了硕士求博士,求了博士求院士,难。什么叫“五阴炽盛”呢?佛教说人是五种要素集合而成:色、受、想、行、识。《阿含经》说:“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识为幻法。”所以“有漏皆苦”。佛经3亿多字,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谛”,“苦集灭道”,知苦、断集、证灭、修道。什么意思?苦是你自己要来的。“佛言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怎样摆脱苦,佛教也有原则,知道苦你就要断掉苦的渠道,你就要阿弥陀佛,念经修道。不要贪财、不要贪官、不要贪色,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打篮球就不要动脚,踢足球就不要动手。

佛教博大精深,“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教义能净化人的心灵,实现人的觉悟圆满,为社会开创解脱的源泉。我们过去说宗教,都把它和迷信联系在一起,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两千多年,都是搞迷信?不是的,佛教给了中国很多的哲学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佛教有很多哲学思想,爱因斯坦说佛教好像是坐在那儿,一切真正的科学原动力就是这么坐着来的。佛教真的这么神吗?若干年前,我隔壁有一个老太太是佛教徒,天天念心经,我天天听也会念了。有一天我见到赵朴初,我说朴老我学了一些佛教知识,会念心经了。他说你念一下,我说朴老您听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朴老说,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请朴老开示,我不懂。他说“色”和“空”是两个哲学概念,这是在讲本质和现象、思维和存在,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我敲隔壁老太太的门,说您是在讲哲学问题。老太太看着我发愣,我说你不是念心经,朴老告诉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讲的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问题,这就是哲学问题啊。老太太说,我不是在讲这个啊,是在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看得破而放不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果,讲得好做不来啊”。

怎么看佛教?坦率地说,作为国家宗教局局长,我到寺庙去,和尚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我知道,他们也是有目的的,想跟我照一张相,以后挂在墙上,如果有人欺负他,他也可以说我跟国家宗教局长是好朋友。我到宁波的时候,主持老人家亲自出来迎接,上了最好的香茶。佛教有一个规矩,他不说话我不能先开口说话,结果他半天不说话,我看到他后面挂了一幅字,是孙中山先生写的,是说佛法要补法律的不足。我于是念出声来:“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总之,佛法补法律之不足。”我说这个话过时间长了,老方丈你要与时俱进啊。老和尚说,叶局长你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